

《民法典》合同效力规则的教义学构造及其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贯

钟瑞栋

(温州大学法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民法典》合同效力规则的外在体系体现了合同编与总则编相互协调的规范安排,并实现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内在体系的融贯。在教义学上,“效力”是指法律对已成立的法律行为的评价,评价的标准是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评价的结果包括有效、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但最终归结为有效和无效。有效的合同对债权具有保障力,对债务具有拘束力。无效的合同包括因内容的违法性而导致的合同无效、因“主体不合格”订立的合同未被追认而无效以及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订立的合同被撤销而无效3种。前者是当然无效、绝对无效,无补正之可能,需要承担私法和公法上的双重责任;后二者的效力可以由相关利害关系人补正,而且只承担私法上的责任。合同效力规则的外在体系是《民法典》外在体系构建的一个缩影,统领该外在体系构建的内在体系则是包括富强、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等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民法典》;合同效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体系;外在体系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2025)02-0029-09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采用了以法律行为与合同为代表的“双中心”编纂方式:一方面参考了“法律行为中心”的编纂方式,在《民法典》总则编以意思表示为中心来统筹各种法律行为;另一方面在债的统合问题上,除将侵权责任法单独成编外,以“合同编通则”来统合各种债,并设立“准合同”分编,体现了“合同中心主义”的理念^[1]。因此,在法律适用上必须将总则编与合同编统合起来,才能找到解决合同纠纷的完整规定。关于合同效力规则体系的规范安排也同样如此。在总则编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中专设第三节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规定,又在合同编第三章就合同效力的特殊问题作出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民法典》对原《合同法》的规定进行人为拆解和重组的结果。如何

正确解读这种“拆解”和“重组”,重构合同效力的规则体系,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破解的重要问题。

合同效力的规则体系是《民法典》外在体系与内在体系相互融贯的典范,也是管窥《民法典》编纂科学化和体系化的重要窗口。本研究拟从“效力”概念的教义学构造入手,通过对合同有效要件的教义学分析,探寻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贯。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合同效力规则的规范体系,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二、民法中“效力”概念的教义学构造

民法上的所谓“效力”问题,一般会在2种情况下提出:(1)指某一法律制度的效力如何。(2)指民事主体实施的某一具体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如何。

[收稿日期]2024-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法典》中的公法规范研究”(20BFX104)

[作者简介]钟瑞栋(1968—),江西瑞金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研究。

在第一种情况下,法律制度的效力是指该制度对相关的利害关系人的拘束力和保障力。在法理学上,当我们提到法律(制度)的效力时,一般是指该制度对人的效力、对事的效力、时间效力和地域效力。但是,在部门法(尤其是在民法)上,法律制度的效力虽然也包含上述要义,但还需更进一步指出这一制度对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影响。因为法律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相关的利害关系人配置权利和义务,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就会因法律的这种配置而享有一定的权利或者承担一定的义务。所谓效力,就是指法律对其配置给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上之力,这种效力对权利人而言就是一种保障力,对义务人而言就是一种拘束力。

在第二种情况下,效力如何的问题又包含2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法律对已成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评价。为此,法律必须设立相应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根据该标准,法律对已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评价结果有4种可能:完全符合有效要件的,有效;完全不符合有效要件(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的,无效;主体不合格的,效力待定;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可撤销。第二层含义是指经过法律评价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行为的当事人在法律上产生的拘束力(义务或责任)和保障力(权利)。例如,如果法律对已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评价结果是有效,则意味着依据该行为在当事人之间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产生,权利人的权利受法律保障,义务人的义务受法律的拘束。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能依据行为的内容来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实施了该行为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果。恰恰相反,由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产生原因基本上都是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因而当事人不仅首先要承担民事责任,还可能要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法律行为生效制度的着眼点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行为的目的是否能现实。行为人实施法律行为的

目的就是希望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或者终止民事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个目的能否实现,首先当然取决于当事人自己,即必须在事实上实施了某一特定的行为。这是个事实问题。其次,要使这个事实问题转变成法律问题,就必须让法律行为接受法律的检讨和评价。这是个价值判断问题。而法律作为行为规范的总和,也为自己的价值判断设定了客观明确的标准,即行为主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这个判断标准,在民法上被称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符合法律所确立的有效要件的行为,就能在法律上产生保障力(对权利而言)和拘束力(对义务而言),行为人实施该行为的主观目的——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或者终止民事权利和义务关系——就能实现。反之,不符合法律所确立的有效要件的行为,就不能在法律上产生拘束力和保障力,当事人实施该行为的主观目的就不能实现,甚至还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合同有效要件的教义学构造

民事法律行为的上述原理同样适用于合同。合同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其成立的意义主要是明确该行为“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也是个事实问题,其实质不过是行为人主观目的的一种表达而已。要使这种主观目的转变为法律现实,从而在法律上具有强制效果——拘束力和保障力,也同样必须接受法律的检讨和评价。换言之,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能否实现,决定于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是否符合法律关于合同有效的要件。根据《民法典》总则编和合同编的规定,合同的有效要件有以下3个方面。

(一) 主体合格

主体合格是指合同当事人具有订立合同的主体资格,主要包括3种情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求合同当事人应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欠缺行为能力的人所订立的合同效力有3种情形:(1)有效。根据《民法典》第145条第1款前段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

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①。(2) 效力待定。《民法典》第145条第1款后段的规定：“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对规定作反面解释，即可得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未经法定代理人追认的，该合同无效”的结论。民法学说将此情形称为效力待定（或效力未定）^②。(3) 无效。《民法典》第14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其次，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代理人必须有代理权。没有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也属于主体不合格。对此，《民法典》分3种情形予以规定：(1) 因有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有效，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162条）。(2) 符合第172条规定的表见代理而订立的合同有效，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3) 不符合表见代理的一般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效力分2种情况：①有效。若被代理人追认，则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若未被追认，则对行为人发生效力，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第171条第1款）。②无效。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被追认前，因善意相对人将该合同撤销而归于无效（第171条第2款）。

最后，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订立合同的，该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必须具有代表权，否则也属于主体不合格。符合《民法典》第504条规定的表见代表而订立的合同，虽本质上属于主体不合格，但基于对交易安全的优位保护，《民法典》将其规定为合同有效。

（二）意思表示真实

意思表示真实主要是指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没有瑕疵。意思表示是合同效力的正当性来源，而意思表示真实是合同的“命根子”。“主体合格”要件强调意思表示的主体的表意能力无瑕疵，“意思表示真实”要件强调意思表示内容的真实性无瑕疵，二者均着意于回归私法自治原则的真谛：表意人自愿受意思表示拘束的正当

性根据在于，该意思表示是表意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真实，包括2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意思表示是在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支配下作出或者受领的；二是指当事人的内心意思与外部的表示行为相一致的状态。“意思表示真实”要件是否成就，法律并不要求当事人从积极层面去证成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而是从消极层面去考察，即只要意思表示不存在不真实的情形，就推定该意思表示真实。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须由主张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该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举证责任，若举证不能，就推定为真实意思表示而受其拘束。

在教义学上，意思表示不真实主要体现为2种情形：

1. 意思表示不自由。意思表示不自由是指表意人的表意行为受到外界的不当或者不法干扰，导致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包括：(1) 欺诈。基于欺诈所为的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一概认定为无效，有失妥当。《合同法》则将因欺诈所为的民事行为的效力分为2种情况，分别对待：损害国家利益的方为无效，其他情形一概为可撤销。《民法典》对此进行了改良，不再区分合同是否涉及国家利益，而是将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统一规定为可撤销合同（第148条），并在此基础上规定因第三人欺诈订立合同的效力为可撤销合同，但对方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除外（第149条）。(2) 胁迫。基于胁迫所为的民事行为，《民法通则》一律作无效处理。《合同法》则规定，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其他情形一概为可撤销。《民法典》第150条将受胁迫（包括受第三人胁迫）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一律规定为可撤销。(3) 乘人之危。基于乘人之危所为的民事行为，《民法通则》规定为无效。《合同法》则规定，如对有急需需要或处于危难处境的当事人有损害的，可以撤销合同。《民法典》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

① 此外，符合《民法典》第172条规定的表见代理而订立的合同和第504条规定的表见代表而订立的合同，也属于主体资格存在瑕疵，但基于对交易安全的优位保护，《民法典》将其规定为合同有效。

② 符合《民法典》第171条规定的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也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

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0条对“缺乏判断力”的认定进行了细致规定。

2. 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即行为人的内心意思与外部的表示行为不一致。主要有以下5种情形:(1)真意保留。基于真意保留所为的民事行为,原则上可以生效。但该真意保留为相对人明知时,民事行为应不生效力。我国《民法典》并未规定真意保留。(2)虚伪表示。基于虚伪表示所为的民事行为,原则上不生效力,但其不生效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民法典》第146条)。(3)隐藏行为。基于隐藏行为所为的民事行为,隐藏真意的虚假意思表示应不生效力,至于被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则应依据关于该意思表示的规定来具体判断(《民法典》第146条、《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4条)。(4)错误。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交易的相关事项缺乏准确认知,导致其作出内心意思与表示行为不一致的意思表示。“交易的相关事项”包括当事人及其资格、标的物的种类和数量、意思表示的性质、交易的价格、履行地、履行期限等,表意人对上述事项的错误认知均可归于错误的范畴。在传统民法上,严格区分错误和误解。前者指行为人非故意的表示与意思不一致;后者指相对人对于意思表示了解的错误。我国民法不作类似区分,在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中,涵盖了错误和误解所包含的内容,并将相应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为可撤销(《民法典》第147条,《总则编解释》第19条、第20条)。(5)误传。误传是指因传达人或传达机关的错误导致行为人意思与表示不一致。误传在我国民事立法上没有单独规定,司法实践中将其作为重大误解的一种处理。

(三) 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

根据《民法典》第465条的规定,合同必须“依法成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民法有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之分,“依法成立”中“依”强调的是“不违反”,所依之“法”显然只能是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而不包括任意性规定。《民法典》从正反两方面对包括合同在内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作出了规定,根据第143条的规定,“不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之一;根据第153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以及“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从逻辑上看,主体合格和意思表示真实都属于“依法成立”及合同有效的题中之义,但主体不合格和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并不当然归于无效,其效力取决于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态度,如前者经有权人追认则合同有效,不追认则合同归于无效;后者经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而归于无效,不行使撤销权则自始有效。总体来看,合同的效力决定权掌握在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手中,故仍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要件则意味着,合同效力的决定权已不(或主要不)掌握在当事人手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一般都属于当然无效、确定无效和永远无效的合同,裁判者可不经当事人请求即可依职权判定合同无效,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或禁止。

四、合同效力体系的教义学重构

(一) 合同效力的两种归宿:有效和无效

关于合同效力的体系构成,王轶教授指出,因为体系化和类型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而我们在进行类型区分时,一定同时也是在完成一个体系的建构。而所有的体系建构也一定都是建立在类型区分的基础上^[2]。基于此,王轶教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将合同行为的效力类型概括为6种:一是生效的合同行为(《民法典》合同编第502条第1款、总则编第143条);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行为(《民法典》总则编第146条第1款、第153条,合同编第2分编第705条第1款);三是相对特定第三人无效的合同行为(仅在与特定第三人关系上不能主张合同效力,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仍然可以主张合同行为效力,特定第三人以外的其他人不能够否定这个合同行为的效力,《民法典》总则编第154条);四是尚未完全生效的合同行为(《民法典》合同编第

502条第2款第2句)；五是可撤销的合同行为(《民法典》总则编第147条、第148条、第149条、第150条、第151条)；六是效力待定的合同行为(出于交易便利、鼓励交易立法宗旨的考虑，尽管删去了《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在《民法典》合同编第1分编通则第3章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中，仍包含效力待定合同行为类型第503条、第504条、第505条)^[2]。王轶教授对合同效力的体系构建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笔者基本赞同。但笔者认为，还可以从法律对已成立的合同进行价值评判的视角，展开对合同效力的体系构建。

以第143条规定的构成要件为价值评判标准，结合《民法典》总则编和合同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和合同效力的其他规定，经评价后合同的效力大致有4种类型：有效的合同(完全符合有效要件的合同)、可撤销的合同(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效力待定的合同(主体不合格的合同)和无效的合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以及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其中，可撤销的合同和效力待定的合同只是法律对已成立合同的初步评价，但非最终结果。二者最终均转化为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如可撤销的合同经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即转化为自始无效；若撤销权人不行使撤销权或者撤销权的行使已超过除斥期间而归于消灭，则合同自始有效(《民法典》第147条至第152条)。又如，效力待定的合同可经追认权人行使追认权而转化为有效，追认权人不行使追认权或者拒绝追认，则合同自始无效(《民法典》第145条第1款)。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45条第2款后段“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的规定，若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也将导致合同自始无效。

综上所述，已成立的合同经评价后最终都转化为“有效”和“无效”2种结果，“可撤销”和“效力待定”只是法律评价的一种初步结论和过渡形式。合同的有效，主要表明的是合同的内容符合法律的评价标准，但并不意味着一定马上生效。有些合同在符合有效要件后，还需满足其他条件方能生效，如附条件和附期限的合同以

及需要有关主管机关审批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

(二) 有效合同的法律效力

有效的合同产生2个“力”，即对债权人的保障力和对债务人的拘束力。详言之，对债权人而言，依照有效合同而设定的民事权利具有法律保障力，这种保障力又可分解为请求力、受领力和救济力。所谓请求力是指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到期债务；所谓受领力是指债务人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受领并保有该履行利益而不构成不当得利；所谓救济力是指若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导致其到期债权不能实现，即可依法追究债务人的违约责任来寻求救济。对债务人而言，依照有效合同而设定的民事义务具有法律拘束力。这种拘束力主要表现为：首先，债务人必须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履行全部债务，否则要承担违约责任；其次，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成为责任财产，构成债权实现的一般担保，对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再次，债务人能够履行而拒绝履行，还可能被强制执行；最后，债务人除履行约定的债务外，还应履行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附随义务。

此外，债权人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的解除权、债务人在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在选择之债中的选择权、抵销权等，以及债权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协助履行等附随义务，也属于有效合同效力的题中应有之义，自不待言。

(三) 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不同事由导致的合同无效，在价值判断上各不相同，法律后果也存在重大差别。合同因违法、违背公序良俗无效与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无效有重大差异，前者在于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道德准则，后者则主要服务于降低沟通成本，以促进交易便捷地达成，故应被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3]。

1. 因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如果合同的内容只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并非当然无效。但如果合同的内容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这类合同无效，而且是自始无

效、当然无效、绝对无效、确定无效,无补正之可能。这是因为,此类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将造成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会造成法律和道德上的双重不良后果,必须加以坚决否定。

法律后果上,在私法效果层面,此类合同的无效意味着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落空,依“合意”而设定的“权利”不具有法律保障力,“义务”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因这类合同无效的根本原因是其具有严重的违法性和反社会性,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所谓“信赖利益”均不具有保护的正当性。因此,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后,不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在公法效果层面,因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往往违反公法上的规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当事人往往应当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如果当事人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原则上不能要求返还,而应当依公法上的规定予以没收。合同的“标的额”往往成为罚款的计算标准(基数)和认定情节是否严重的重要考量因素。《民法典》第157条后段中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针对的主要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

2. 因“主体不合格”订立的合同未获得有权人的追认而归于无效的法律后果。此类合同无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中一方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民法典》第145条)或者没有代理权(《民法典》第171条),若合同有效,将损害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因此法律将合同效力的决定权赋予该特定第三人。若该特定第三人追认,则合同有效;不追认,则合同无效。当此类合同因未被有权人追认而归于无效时,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处理:若一方或者双方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应当相互返还财产(“返还财产”的性质,若承认物权行为,则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若不承认物权行为,则属于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性质上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由于此类合同所调整的利益冲突是缔约双方的利益与特定第三人的利益之间的冲突,与

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因“主体不合格”最终被归于无效的合同只有私法上的责任,而无公法上的责任。

3. 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订立的合同被撤销权人撤销而无效的法律后果。笔者将调整此类合同的规范称为“授权一方当事人的规范”,是指法律将合同(法律行为)效力的决定权赋予经济实力、知识、经验等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的规范。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则合同自始无效。根据《民法典》第147条至第152条的规定,无论是基于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还是基于显失公平,其中至少有一方当事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可依《民法典》第157条中段“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由过错方向对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若双方都有过错的,可以实行过失相抵。如果一方或者双方已经履行的,应当依照第157条前段的规定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此类合同调整的利益冲突类型是缔约人之间的私人利益冲突,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亦无直接关联。因此,一般情况下,即使此类合同最终因被撤销而归于无效,原则上过错方只需承担私法上的责任(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和赔偿损失),而无公法上的责任。例外情形是,如果欺诈方构成诈骗罪、胁迫方构成敲诈勒索罪等犯罪,则欺诈方、胁迫方不仅要承担私法上的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四) 合同不成立、无效与未生效的区别

1. 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意蕴。有学者认为,合同无效与合同不成立并无实质区别^[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根据《民法典》第134条第1款和第136条第1款的规定可知,合同成立与否的标志是缔约双方是否形成合意,若缔约人就双方的权利义务之得丧变更达成了一致意见,合同就告成立,反之则合同不成立。如前所述,合同成立与否是一个事实问题,即缔约双方是否作成了一个旨在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与价值判断无涉。合同成立是确认合同是否有效的前提。正如同合同成立与合同有效是2个不同概念一样,合同不成立也是一个事实问题,仅仅标明缔约人未能就合同的主要条款

达成一致意见，即未形成合意；而合同无效是根据法律设定的合同有效要件对已成立合同的效力否定，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合同不成立就无评判有效与否的必要和可能，更谈不上生效与否的问题了。此外，合同不成立的法律后果一般仅限于私法上的责任（缔约过失责任），而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则既有私法责任，也可能有公法责任。

2. 合同无效的价值判断。合同是否有效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即双方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如果符合法律的价值评判标准，则合同有效；反之，若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与法律的价值评判标准有根本冲突，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违法性和反社会性，则合同无效（《民法典》第153条）。

3. 合同未生效及其效力补正。有效的合同虽然符合法律的价值评判标准，但未必马上生效。合同未生效很可能是由于当事人为合同的生效附设了条件或者期限。附条件的合同规定在《民法典》第158条，附期限的合同规定在《民法典》第160条。附条件的合同和附期限的合同均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与价值判断无涉。

此外，如果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发生效力，则合同的生效时间应当以有关主管机关批准或者登记为准；未办理批准等手续影响合同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履行报批等义务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效力；应当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的当事人未履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违反该义务的责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的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批准的时间为合同变更、转让、解除的生效时间（《民法典》第502条，《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2条）。由此可见，《民法典》对未生效的合同采纳了合同效力补正理论。

五、合同效力规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贯

民法的体系由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构成，内在体系的价值取向引导外在体系，而外在体系的

各个要素——概念、规范与制度构成内在体系的载体^[5]。运用民法体系的内部和外部的划分作为分析框架，是研究《民法典》编纂问题的基本方法。外在体系以“逻辑”为目标，通过概念位阶清晰、规范配置合理，形成法典的形式理性；内在体系以“价值”为目标，通过多元价值确立、多元价值实现，形成法典的实质理性^[6]。合同效力的规则体系也是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统一体，二者呈相互依托、相互交融的关系。在外在体系上，合同的效力规则通过厘清效力概念、界定合同的有效要件、明确合同有效和无效的法律后果，为合同效力的判定确立了清晰的标准；在内在体系上，合同的效力规则集中反映和体现了对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民法典》合同效力规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贯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效力”概念的厘清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贯

无论是对民事权利的保障力还是对民事义务的拘束力，都不仅对合同当事人有效，使“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成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同时，“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对裁判者也同样有效。详言之，如果当事人就已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发生纠纷，裁判者在裁判时，首先就应当依照当事人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裁判，合同中约定的意思表示就成为法官或者仲裁机构裁判的准则，合同也因此具有准法源的地位，使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反映了《民法典》合同编对自由和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尊崇和保护^[7]。

（二）合同的主体资格要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贯

《民法典》通过行为能力制度规定了合同关系参加者的主体资格，将不合格的主体排除在合同关系之外，可以控制合同关系的参加者的范围，实现合同交易参加者方面的秩序。《民法典》关于行为能力的规范，使欠缺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得以从对其不利的合同中解脱出来，体现了对弱者提供特殊保护的政策导向。由于行为能力欠缺的主体无意思能力，意思自治要求“唯有健全的自我决定才值得完全尊

重”^[8]，即意思自治要求意思表示应健全而无瑕疵，对这类主体订立合同加以限制本质上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尊重。因此，将主体合格作为合同的有效要件，既体现了《民法典》对弱者保护的取向，也是其对自由、公正和法治价值追求的重要表征。将符合表见代理和表见代表而订立的合同规定为有效合同，体现了对交易安全的优先保护，有助于弘扬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意思表示真实”要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贯

“意思表示真实”要件集中反映了意思自由和交易安全两种价值的冲突，而对于意思表示瑕疵的处理态度最能体现立法和司法上价值判断的倾向和利益诉求的平衡及兼顾，最能表现立法政策上之价值选择及利益衡量^[9]。当表意人在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时，法律上的评价应能公平调和表意人与相对人之利益。一方面要尊重成为私法自治基础之表意人的意思自主；他方面须确保交易安全，不使相对人乃至利害关系人之第三人受不测之损害^[10]。因此，“意思表示真实”作为合同有效要件兼顾了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体现了对自由、公正、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

（四）“合法性”要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贯

合法性要件是对合同进行内容控制的“总闸”和底线。《民法典》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强制性规范仅占很小的比例，大部分的强制性规范都在《民法典》之外，在规范性上属于公法规范。因此，合法性要件是《民法典》将公法规范引入法典的重要管道，体现了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控制，是合同有效的底线和前提。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是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规范，公序良俗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涉及我国社会生活的政治基础、社会秩序、道德风尚和善良风俗，二者均是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设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对违法和背俗的合同如不加以限制和禁止，将严重背离社会生活的目的，危害巨大。由此可见，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作为合同的有效要件，既可

以在外在体系上搭建《民法典》与其他法律沟通的桥梁，实现公法与私法的“接轨”，又可以在内在体系上实现《民法典》与其他法律的价值统一。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认定为无效，也利于醇化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实现良法善治，弘扬文明、和谐、公正和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合同效力的补正规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贯

《民法典》对未生效的合同采纳了合同效力补正理论，当事人订立合同后未办理批准或登记手续的情况可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当事人自身的原因，也有批准、登记机关的原因，而且后者往往是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当事人先履行合同，后补办手续、登记的行为，应当采取适当宽容的态度，只要他们及时补办完批准、登记手续（一般限定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应当认定合同有效^[11]。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一贯秉持的司法态度，并通过出台一系列司法解释，尽量减少无效合同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合同编通则解释》《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合同法解释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建设工程合同解释》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解释》等，均吸收了合同效力补正理论，最大限度地减少合同无效的情形，促进当事人积极履行合同，从而既体现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的协调，又有利于鼓励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倡导自由、公正、法治和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十分鲜明。

六、结 语

《民法典》外在体系与内在体系的融贯需仰赖精致的立法技术^[12]。作为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统一体，民法中的逻辑体系与价值体系呈相互依托、相互交融的关系。《民法典》的制度设计和规范配置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合同效力规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并非停留于口号，而是通过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融贯来加以贯彻和体现。合同效力规则的外在体系体现了合同编与总则编相互协调、相互呼应的规范

安排，是《民法典》外在体系构建的一个缩影，而统领该外在体系构建的内在体系则是包括富强、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等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 周江洪. 中国民法典的精神实质与核心要义 [J].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20 (5): 20-28.
[2] 王轶. 《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的重点问题 [J]. 法律适用, 2020 (19): 3-16.
[3] 许德风. 合同效力的类型界分 [J]. 中国法律评论, 2023 (6): 19-31.
[4] 吴光荣. 中国民法语境下“合同效力”的层次性 [J]. 现代法学, 2024 (1): 177-192.
[5] 朱岩. 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构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2): 151-168.

[6] 钟瑞栋. 《民法典》对“体制中立”民法传统的承继与超越：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内涵及立法技术 [J].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22 (1): 46-58.
[7] 钟瑞栋. 《民法典》合同编“一般规定”的体系构成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贯 [J]. 法治社会, 2022 (4): 40-53.
[8] 朱庆育. 民法总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61.
[9] 潘军锋. 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界分法律问题研究 [D]. 南京：东南大学, 2007.
[10] 陈自强. 意思表示错误的基本问题 [J]. 政法法律评论, 1994 (52): 311-344.
[11] 柳经纬, 主编. 合同法 [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4: 143.
[12] 钟瑞栋, 毛仙鹏. 《民法典》中“依法”的规范功能 [J]. 财经法学, 2022 (4): 132-147.

The Dogmatic Structure of the Contract Validity Rules of China’s Civil Code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ZHONG Ruidong

(Law School,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external system of the contract validity rules of China’s *Civil Code* reflects the normative arrangement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Contracts and the Book of General Provisions, while achieving coherence with the internal system guided by Socialist Core Values. From a dogmatic perspective, “validity” refers to the legal evaluation of an established juristic act, with the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be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validity. The outcomes of such evaluation include valid, invalid, of undetermined validity and revocable, ultimately boiling down to validity and invalidity. A valid contract ensures guarantee effect on claims and a binding effect on debts. Invalid contracts encompass three categories: (1) invalidity due to illegality of content; (2) invalidity arising from non-ratification of contracts concluded by “unqualified parties”; (3) invalidity triggered by rescission of contracts formed through “inauthentic expressions of intent”. The first category is ipso jure void and absolutely void, irremediable under law, and entails dual liability under private law and public law. The latter two categories permit ratification by relevant stakeholders and incur liability solely under private law. The external system of contract validity rules serves as a microcosm of the Code’s external architecture. The internal system guiding this external structure is rooted in Socialist Core Values, encompassing Prosperity, Harmony, Liberty, Equality, Justice, Rule of Law and Integrity.

Key words: *Civil Cod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ernal system; external system

(责任编辑 冯庆福)